联 合 国 S/PV.5220



安全理事会

第六十年

临时逐字记录

第五二二〇次会议
2005 年 6 月 30 日星期四上午 10 时 20 分举行
纽约

主席：	德拉萨布利埃先生	（法国）
成员：	阿尔及利亚	本迈希迪先生
	阿根廷	马约拉尔先生
	贝宁	津苏先生
	巴西	塔里斯·达丰托拉先生
	中国	张义山先生
	丹麦	洛伊女士
	希腊	瓦西拉基斯先生
	日本	北冈先生
	菲律宾	梅尔卡多先生
	罗马尼亚	莫措克先生
	俄罗斯联邦	杰尼索夫先生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埃米尔·琼斯·帕里爵士
	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	马农吉先生
	美利坚合众国	帕特森夫人

议程项目

非洲粮食危机对和平与安全的威胁

世界粮食计划署执行主任詹姆斯·莫里斯先生介绍情况

05-40441 (C)



上午 10 时 20 分开会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非洲粮食危机对和平与安全的威胁

世界粮食计划署执行主任詹姆斯·莫里斯先生介绍情况

主席（以法语发言）：根据安理会先前磋商中达成的谅解，我认为安全理事会同意按照其暂行议事规则第 39 条向世界粮食计划署执行主任詹姆斯·莫里斯先生发出邀请。

没有人反对，就这样决定。

我请世界粮食计划署执行主任詹姆斯·莫里斯先生在安理会议席就座。

安全理事会现在开始审议其议程上的项目。安理会是根据其先前磋商中达成的谅解开会的。

在本次会议上，安全理事会将听取世界粮食计划署执行主任詹姆斯·莫里斯先生的通报。通报之后，我将请那些希望发表评论或向莫里斯先生提出问题的成员发言。

我现在请世界粮食计划署执行主任莫里斯先生发言。

莫里斯先生（以英语发言）：我非常感谢有这次机会与安理会探讨一系列人道主义问题，尤其是它们影响到非洲的和平与安全。

主席先生，昨天，我认真听取了你在午餐会上所作的评论。我认为，你用短短的几句话，就在人道主义议程和发展议程涉及和平与安全的棘手问题方面，并针对这些问题对确实如此绝望处于危险之中的亿万人民所产生的非同寻常影响，提供了非凡的深刻见解和指导。你说，应当将注意力集中于至关重要的问题。你也指出，没有和平，就不可能实现千年发展目标。确实，我愿指出，没有和平，就没有实现千年发展目标的机会。你谈及必须加快冲突后进程，以争取实现全面发展目标。你然后说预防不过是一种常识，发展领域取得进展的最佳途径是善政。我对一个人可以用如此精炼的语言表达如此多的内容表示敬佩。你们的评论很有力量。

几个星期前，尼日利亚的奥巴桑乔总统来罗马拜访了世界粮食计划署执行局。他来谈粮食同和平与安全之间的关系。然而，他说了一句令我永生难忘的话：“饥饿者乃愤怒之人也。消除其愤怒肇因符合我们大家的利益”。

近来，我荣幸地第五次作为秘书长南部非洲人道主义需求问题特使巡访南部非洲。儿童基金会的安·维尼曼和联合国艾滋病毒/艾滋病联合规划署(艾滋病规划署）的彼得·皮奥全程陪同。

我的判断是，我们当今世界面临的最大人道主义危机不在达尔富尔，不在阿富汗，也不在北朝鲜，尽管这些问题都富有挑战性。最大人道主义危机是南部非洲社会体制的逐渐瓦解。饥饿是这个问题的核心所在。艾滋病、连年干旱、管理不善和能力失调等问题不可救药地结合在一起，正在侵蚀社会和政治稳定。

涉及南部非洲的种种事实极为惨烈、触目惊心。去年有 100 万人丧生于艾滋病。我们正在进入 2005 年至 2007 年该流行病发病高峰。数字仍在不断上升。该区域平均预期寿命已减少 20 年。想一想这个问题吧。在北美洲、欧洲和日本，儿童预期寿命比马拉维、赞比亚和津巴布韦儿童将近长一倍。南部非洲大部分人的预期寿命同欧洲中世纪人的预期寿命差不多。如果说有什么令人感到悲痛的话，那就是所有这一切对儿童产生的影响，这种情况绝对应该受到谴责。

世界粮食计划署今年早些时候估计，南部非洲将有 350 万人需要紧急粮食援助。我们今天的估计是，有 830 万人需要粮食援助，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该区域一月、二月和三月份大部分时间都没有下雨。津巴布韦的危难人数有 400 多万人，马拉维有 160 万人，赞比亚有 120 万人，莫桑比克有 90 万人。如果人们考虑到，世界粮食计划署前两年还能够在赞比亚购买 15 万公吨粮食用于世界其他地方，则赞比亚一案就尤为重要。

艾滋病毒泛滥正在造成大批人死亡并缩短预期寿命。这个问题直接削弱了社会生产足够粮食的能力。成年人口艾滋病毒流行率从低端的莫桑比克 12%，到高端的斯威士兰 42%不等。政府部长们经常谈论其最亲密同事丧生艾滋病，他们担心教育和卫生系统正在瓦解。2003 年，莱索托失去了其 1/3 的健康劳动者及其 15%教师。莱索托总理曾对我说，“吉姆，到 2010 年，我国的一半教师都将死于艾滋病”。赞比亚总统姆瓦那瓦萨告诉我，在他的国家，教师越来越少，其减员速度是其替换速度的两倍。

在许多农村村庄以外的地方，土地休闲而无人耕作。整整一代人缺失了。没有人教下一代如何务农。该区域增长最迅猛的行当是殡仪业。艾滋病造成将近 800 万非洲农民死亡，这个数字比北美洲和欧洲联盟务农者总数之合还多——这是个令人震撼的事实。今天，撒哈拉以南非洲有 1 400 万儿童因艾滋病毒/艾滋病而成为孤儿，这个数字在今后五年内将增加到 2 000 万人。这种人口状况根深蒂固，我们短期内无从扭转这一数字。

我希望可以找出一种办法，唤起大众和媒介对南部非洲苦难的适当关心。我永远不会忘记斯威士兰的一位 70 岁老奶奶。她和她 80 岁双目失明的丈夫一起掌管着一个有十几名幼儿的家庭。有的是他的孙子孙女，有的则不是。在非洲大部分地区，村庄充当着大家庭角色。这是他们的社会安全形式。在有些方面，这个制度令世界羡慕不已。然而，在艾滋病死亡人数最多的地方，这个制度已捉襟见肘，濒临崩溃。

饥饿乃是失败的症状：作物歉收、无法对付自然灾害和未能克服社会不平等现象、族裔纷争和种族仇恨。然而，要处理饥饿和营养不良问题，拯救处于最水深火热之中的妇女和儿童，就必须让那些失败地区的负责人彼此合作。即使有民政当局的合作，运送粮食和其他人道主义援助也是一项危险的工作。除维持和平行动部外，世界粮食计划署失去的工作人员比任何联合国机构都多。攻击运输车队和劫持人质的情况并非不常见。我们前几个星期就有三名职员在达尔富尔丧生。

联合国有食物权问题特别报告员让·齐格勒。在某些方面，他和我的政治和经济观点大相径庭。他是一位瑞士主要社会主义者，而我是一个坚定的美国资本主义者。但他是一个好人，我们之间的关系很好。我希望他也会这样说我。我们通过不同的镜头看世界，但我们在一个问题上完全一致：即脆弱饥饿者、特别是妇女儿童有权获得食物。我们同意粮食永远不应成为战争武器或外交胁迫的工具。尽管里根总统对埃塞俄比亚当时的共产主义政权极为反感，但他也在 1985 年埃塞俄比亚大饥荒期间批准美国向埃塞俄比亚提供粮食援助时雄辩地阐明这一点。他简练地说，“饥饿儿童不涉及任何政治问题”。无论一国政府公认罪过如何，也无论人民激愤程度如何，我们都不能把援助作为紧急情况的政治策略。

在过去 10 年里，我们看到在达尔富尔、苏丹南部、索马里、安哥拉、乌干达北部、刚果民主共和国和西非，饥饿被当作战争武器。这一战术不是非洲特有的；1992 年在欧洲，波斯尼亚塞族在包围萨拉热窝时使用过它。当仇恨剥夺了我们的修养时，我们都能够从事令人无法置信的暴行。今天，把粮食当作武器的最奇怪的例子发生在达尔富尔，那里的局势继续恶化。在 1 月份，我们估计 280 万人需要获得粮食援助以避免大规模饥饿；今天，这一人数更加接近 350 万。我们在粮食方面的工作做得相当好，但是难民营工作人员担心的是，随着达尔富尔粮食供应的减少，更多的人将来到难民营，那里的联合国和非政府组织捉襟见肘，无法提供水、卫生和基本保健服务。

在非洲许多地方，饥饿的普遍性是社会不稳定程度的一个精确的衡量标准。不管不稳定是由国内冲突、干旱、艾滋病、治理不善还是这些因素的任何组合引起的，饥饿几乎总是这些因素之一。联合国对过去 20 年里非洲 6 次冲突的审查表明了武装冲突同农业减产之间的绝对联系，平均每年为 20%，同时饥饿的普遍性有了增加。

冲突显然可以引起饥饿，但是反过来的情况如何？饥饿同冲突之间的联系类似于饥饿同贫困的关

系。饥饿既是贫困的原因，也是后果。它也既是政治冲突的原因，也是后果。

每三个非洲人中有一人营养不良，过去 10 年里这方面没有任何改变的迹象。在中部非洲，刚果民主共和国的战争给该地区带来了动乱，营养不良人口的百分比从 1995 年的 53%增加到今天的 70%以上。在冲突是较小因素的其他地区——加纳、尼日利亚、马拉维和马达加斯加——人民的营养状况有了改善。我们大家都在进行所谓的“弱点绘图”的工作，我们利用各种指数，如市场价格、营养不良比率和家庭粮食消费格局来制图，标明饥饿的热点。在索马里、苏丹和乌干达北部等地的热点同政治暴力之间的联系是惊人的。

非洲农村的长期饥饿具有破坏性影响，损害了政治稳定与安全。它促使农村人口继续迁往城市，那里存在的至少某些基本的社会服务——包括补贴或免费的食物——成为人民前往城市环境的诱因。抗反转录病毒疗法有可能更加广泛地提供——无疑首先在城市地区——这也会成为一种吸引力，加快、鼓励和增加农村向城市的移徙。一波又一波的艾滋病孤儿正在逃离农村并进入城市，但没有任何经济支助手段，常常助长了社会解体和犯罪。在乌干达北部之类的地区，饥饿儿童远为更加容易被招募为儿童兵。我们需要作出积极努力通过学校喂食和其他活动把这些儿童留在农村地区和学校中。

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城市人口增长预测是世界上最高的，在内罗毕、拉各斯和卢萨卡之类的城市中，年增长率超过 6%。农村向城市的移徙对非洲就业的影响恰好同西欧和美国相反——它导致更高而不是更低的失业率和社会不稳定。在某个程度上，市政府的能力达到极限，无法满足社会需求，加深了也许仍然不习惯于分享同一空间的相互竞争的民族群体之间的内部政治和社会紧张。

为获得有限的粮食资源进行的竞争可能触发暴力和不稳定。非洲农业如此依赖降雨以及游牧人口相对较大的事实促成了可能引发冲突的人口移徙。例如，达尔富尔暴力减少了牧民的迁移，在缺水的地区过度放牧，结果造成干旱条件。数十年来，我们不仅在苏丹，而且在毛里塔尼亚、塞内加尔和其他地方也看到这种问题。当家庭无法种植或销售畜产品，它们开始迁移。多数市场被关闭，战斗几乎消除了种植，谷物价格暴涨。不安全促使人民向北迁移，对稀少的水和野生食物的供应造成无法承受的负担。3 月份，一个机构间特派团警告说，如果没有更多的援助，更多人将背井离乡，增加国内流离失所者社区同东道主社区之间的紧张。

苏丹内战的高潮期间粮食被当作武器。1988 年的饥荒夺去了 25 万人的生命。现在，苏丹大部分地区达成和平协定，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对粮食援助的支持减少了，这很可能破坏和平进程。我们估计，在苏丹其他地区受到和平进程普遍影响的至少 320 万人面临饥饿的严重威胁，需要粮食。现在逃离苏丹进入邻国肯尼亚和乌干达的流离失所者的人数超过返回家园的难民。这是相当惊人的。

大量国内流离失所者和难民的继续存在是对政治和社会稳定的内在威胁，而饥饿的威胁为重新安置他们制造了重大的复杂因素。例如，很难说服在安哥拉的一个家庭返回其原籍村庄，如果它没有足够的粮食过渡到下一次收获。粮食计划署对遣返一揽子计划进行了大量投资，使前战斗人员在家园重新安顿下来时能够养活自己和家人。

粮食援助是非洲的解除武装、复员和重返社会努力的一个关键组成部分。仅在过去 5 年中，我们的目标对准利比里亚、布隆迪、索马里、刚果民主共和国、塞拉利昂、卢旺达和安哥拉的 80 万战斗人员。我不得不提到，让我们看看利比里亚冲突各方的前战斗人员，他们中 70%至 80%是年纪很小的儿童。就在上周，我们为刚果民主共和国的 15 万前陆军和民兵战斗人员批准的一个新的复员援助一揽子计划，近几个月来，那里复员和解除武装的压力有了增加。

在西非，数以千计的人仍然因为一场超过 10 年的战争而流离失所，粮食援助被用来帮助恢复社会和

经济稳定。我的一位同事报告说，西非今天的稳定是脆弱的，如果人民缺乏基本的粮食、住所和保持其家庭健康的手段，就不可能取得进展。粮食援助现在是支助教育、帮助重建社区和让人民获得保障其本身福利的手段的工具。

关于科特迪瓦，南非促成的和平协议使人略感乐观，但该国仍然处于危险的分裂状态。解除武装活动订于本星期开始进行，但这将是一项挑战。我们在该地区的行动锁定的目标是 922 000 人，其中包括科特迪瓦的 700 000 人，其他人则分布在布基那法索、马里和加纳等邻国。我们为科特迪瓦境内 26 000 名利比里亚难民和流离失所者提供口粮。科特迪瓦的战斗显然是由于被剥夺政治权利而引起的。在这方面，由于经济停滞，生活标准下降，国内流动人数增加，造成争夺有限农业资源的情形，这种争夺也起了某种作用。

我们认为，在现代生活中，很少有像人道主义援助这样具有政治性的现象。世界各主要捐助者关于资助人道主义援助项目的选择都显然带有政治性。有些捐助者做出的选择是为了使其紧急援助具有全球性，其他捐助者则将精力集中在各区域、前殖民地或它们认为在国内具有最大社会经济利益的地方。前不久，我们对通过粮食计划署提供的援助和包括人道主义援助在内的更广泛的官方发展援助格局进行了比较，其结果很有趣。2003 年，23%的官方发展援助提供给了最不发达国家，24%提供给了非洲。粮食计划署的援助主要倾向于紧急援助，主要集中在非洲。我们四分之三的援助——工作——是面向最不发达国家和非洲各国。

总的官方发展援助承诺数额正在增加，欧洲最近的各项举措、特别是北欧各国和欧洲联盟的各项举措尤其令人鼓舞。粮食援助在非洲至关重要，但粮食援助正在急剧下降。就全球而言，去年，不包括伊拉克在内，粮食援助减少了 180 多万公吨。与此同时，全世界饥饿人口实际上增加了，从 1990 年的 79 000 万人增加到今天的 85 200 万人。在过去 25 年里，按照中国自己的标准衡量，中国人成功地使 3 亿多人摆脱饥饿和贫穷，这确实是人类伟大成就之一，如果不是因为这项了不起的成就，世界饥饿人口则会难以想象。

有时我想，今天，在非洲，一个饥饿儿童所能处的最糟糕地方是一个与邻国相安无事并且局势相对稳定、但就是贫穷的国家，因为援助金额是随着暴力程度和媒体的关注而增加的。

捐助者日益重视一些不太引人注意的紧急状况，我们对此感到鼓舞。布什总统最近宣布向北朝鲜提供 5 万吨粮食援助，这尤其值得欢迎，德国在此之前提供的捐助也特别值得欢迎。

请允许我向安理会举一个非常强有力的例子，帮助说明粮食援助的重要性。如果将北朝鲜一名七岁男童与南朝鲜一名七岁男童相比较，北朝鲜男童会矮 8 英寸，轻 20 磅。

布莱尔委员会进行了出色的努力，将大众的注意焦点放在非洲的人道主义和发展需要上。卢拉总统、希拉克总统和拉戈斯总统以及萨帕特罗首相正在共同努力，使饥饿成为一个最高度优先事项。

在我结束发言时，请允许我感谢安理会各成员对非洲饥民的支助，对世界粮食计划署的支持。法国最近将其捐助增加了一倍；日本、丹麦和联合王国一直是紧急状况的强大捐助者；俄罗斯、中国和印度加入了援助者行列。2004 年，美国再次提供了 10 亿多美元的支助。

对非洲而言，目前正在出现各种令人鼓舞的迹象。八国集团的债务举措；恢复义演援助活动所反映的人民的重新重视；布什—布莱尔提供 67 400 万美元紧急粮食援助的宣示；非洲发展新伙伴关系和非洲联盟的努力；以及当地发起的其他发展举措使我们有理由感到乐观。粮食计划署正在努力使其做法更具创意，正在与世界银行合作，研究埃塞俄比亚的一个饥饿保险计划。埃塞俄比亚是一个奇特的地方，它的人均紧急支助金额最高，但人均发展支助金额却最低。此外，我们正在寻求办法，使你们向我们提供的支助

产生最大效果。在某些方面，我们正在从保险业的角度看问题，因此，我们将从精算学角度确定你们向我们提供的支助实际进入我们银行账户的可靠性。一旦我们从精算学的角度确定可能收到的资金的可靠性，我们就可以从第一天开始，使用这笔资金，而不需等到资金实际转入账户之后才使用。我们知道，如果我们能够早点使用我们拥有的资源，我们或许可以用同样数额的资金，使一年内喂饱的人口增加 20％。

我们感到骄傲的是，就全球而言，自 1990 年代中期以来，粮食计划署已经在 25 个国家逐步停止粮食援助。有一天，我们也要在非洲停止粮食援助。

2000 年，在千年首脑会议上，每个国家都在此承诺，将饥饿和贫穷人口减少一半。现在应该是显示进展的时候了，在这种进展的基础上，我们可以在这个多灾多难的大陆开始建设和平与稳定。我们所有人都可以对投资发挥的最强大影响就是找到办法，喂饱世界上的 3 亿饥饿儿童。这个提议是可行的；这个提议的费用不高。其回报是，在青年人生命的早期，在他或她有机会上学的时候，哪怕在仅仅几年的时间里，喂饱他/她，改变其人生，这个儿童生命的一切、这个社区的一切以及最终这个国家的一切都会因此而改善。如果与东道国一道努力，开展这项活动的资金需求并不高，但我认为，这是我们实现千年发展目标的最好机会，在十年时间里，可以在全世界几乎消除儿童饥饿现象。

主席（以法语发言）：我感谢世界粮食计划署执行主任作非常全面的通报。

这次会议没有发言名单，因此，我请希望发言的安理会成员向秘书处表示发言意愿。

洛伊女士（丹麦）（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首先，请允许我感谢你安排今天的通报会。关于非洲粮食危机对和平与安全的威胁，邀请詹姆斯·莫里斯先生向安全理事会作通报的举措可以帮助扩大我们对安全理事会预防和解决冲突工作的认识。

此外，我还感谢莫里斯先生作透彻通报，他的通报明确显示，提出的见解对安理会工作非常有用。请允许我表示，莫里斯先生关于非洲数百万贫民每天所面临困境的叙述是为我们工作进行的现状摸底，极为有用。

我们所有人都可以发挥作用，都有责任，帮助打破不稳定局面、贫穷和长期人道主义危机的恶性循环。第一个千年发展目标就是在 2015 年之前使贫穷人口减半，除其他事项外，实现这个非常宏大目标的前提条件之一是，人道主义援助活动必须能够促进向发展过渡。

预期将设立的建设和平委员会将标志着一个新的开端，将为走出冲突国家采取全面做法。在冲突后阶段，委员会将提供协调论坛，其中包括协调与人道主义问题相关的行动。

苏丹局势已在昨天磋商时得到大量讨论，但我仍要重申我们对人道主义局势的关切。目前，苏丹南部有成千上万难民和国内流离失所者返回，需要继续展开救济工作，确保和平与稳定。

我们赞同莫里斯先生对非洲人道主义局势，尤其是所谓粮食不安全、艾滋病毒/艾滋病和施政能力衰减三重威胁影响的严重关切，这与非洲许多国家包括津巴布韦目前的事态发展有关。我们严重关切津巴布韦目前危机，它已造成 275 000 多人无家可归，导致人道主义危机进一步恶化。津巴布韦政府必须履行其国际义务，特别是严格尊重人权。

鉴于津巴布韦目前局势，我们赞扬秘书长任命联合国人居署执行主任为津巴布韦人居问题秘书长特使，并期待她从津巴布韦返回后提出报告。

我想向莫里斯先生提几个简短的问题。

第一，希望莫里斯先生谈谈世界粮食计划署与维持和平行动部间协调，比如在处理冲突局势中粮食不完全问题和此类地区粮食援助工作方面，特别是在苏丹。

第二，已经正确强调需要采取非常措施解决三重威胁以及不稳定可能造成的潜在威胁。莫里斯先生认

为，目前国际工作当务之急是什么？更具体讲，他如何看待世界粮食计划署的作用？

第三，作为联合国特使，莫里斯先生反复强调在约翰内斯堡建立的联合国南部非洲行动协调安排。这种安排特别成功原因何在？他是否认为联合国可从中得出一些普遍性经验？

最后，如果世界粮食计划署决定向津巴布韦提供粮食援助，是否将从政府方面得到保证，把援助分发给真正需要者？

最后我赞扬詹姆斯·莫里斯先生发挥积极倡导作用，突出在危机中深受其害的数百万人民的困境，他们身受危机之害，但这些危机却常常被我们忽视。

杰尼索夫先生（俄罗斯联邦）（以俄语发言）：我也愿向世界粮食计划署执行主任表示欢迎，感谢他今天的通报。

我们完全赞成尼日利亚总统奥巴桑乔提出、莫里斯先生在今天通报开始时参用的思想，即（以英语发言），“饥饿者乃愤怒之人也”。大家都了解，事实确实如此。因此，作为国际社会负责任的一员，俄罗斯认为加强和平与安全的挑战与非洲和世界其他不安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有内在的联系。为此，我们在各领域努力协助非洲国家。

我举两三个数字。俄罗斯已经取消或承诺取消非洲国家 160 多亿美元的债务，其中包括在重灾穷国倡议中取消的 20 多亿美元债务。我国政府还进一步承担风险，决定向重灾穷国倡议信托基金提供更多资金，并参加国际开发协会下一轮充资行动，用于 2006-2014 年阶段。西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将得到其中近半数——即 49%。我们正在继续努力，在公共卫生领域帮助非洲培训本国人员。此外，我国还在双边基础上经常提供紧急人道主义援助。

但我们认识到，这样做还不够。因此，我国正在同多边捐助者，主要是世界粮食计划署，发展伙伴合作关系。莫里斯先生在发言中已谈到这一事实。今年我国将为粮食计划署人道主义活动提供经常性贡献。

我们完全赞成，只有国际社会协调行动，向非洲国家提供援助，主要是在人道主义领域，才能帮助这些国家在执行千年发展目标方面取得进展。

塔里斯·达丰托拉先生（巴西）（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感谢你及时安排今天的通报。我也感谢世界粮食计划署（粮食计划署）执行主任詹姆斯·莫里斯先生为我们介绍的情况。

正如我们在最近有关在武装冲突中保护平民的辩论中指出，因冷战后冲突引起的人道主义灾难数量与规模惊人。由于种族清洗、流离失所、蓄意伤害以及饥饿的沉重后果，平民日愈成为武装冲突的受害者。

安全理事会对冲突造成的人道主义危机问题已给予适当考虑，我们欢迎有此机会探讨饥饿与武装冲突之间的关系，以及国际社会如何协调行动，最有效地解决这一问题。

世界粮食计划署是在紧急状况，包括因自然原因造成和由冲突造成的紧急状况中提供急需粮食物品后勤能力最强的联合国机构。我们现在讨论的主要是因冲突造成的紧急状况。

考虑到巴西参与克服饥饿与贫困的行动，毫不奇怪，我国高度重视粮食安全概念，它是世界粮食计划署的工作支柱之一。确保粮食安全是我们的道德义务，包括在紧急状况中和长久基础上。

我们充分赞成粮食计划署双管齐下的方针，通过执行紧急救济和结构上更注重发展的行动，解决这两项任务。需要双管齐下方针解决饥饿与冲突之间的关系，因为创造条件让深受冲突祸害的国家摆脱冲突，离不开粮食安全。同样，没有粮食安全，和平社会更容易陷入冲突。

国际社会必须解决冲突与人道主义危机深层的社会经济肇因，预防冲突的出现、扩散和复燃。必须从这一角度认识粮食计划署确保长期粮食安全的努力。

最后我们指出，为了使世界粮食计划署能够成功地履行确保粮食安全的作用，必须为粮食计划署提供

可靠的技术资源，没有这些技术资源，在制订优先任务时，某些紧急状况往往会被遗忘。

因此，我们必须改进我们所能运用的财政机制，同时强调必须按照现有需要提供人道主义援助，而且以非歧视、平衡与相称的方式分配这一资源。

莫措克先生（罗马尼亚）（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我要感谢你安排了安全理事会成员与世界粮食计划署执行主任之间这次非常好的意见交换。我要与安理会其他成员一道，感谢秘书长南部非洲人道主义需求问题特使詹姆斯·莫里斯先生所作的有用而及时的情况介绍，尽管所介绍的情况是严峻而发人深思的。今天，非洲大陆所面临的严重人道主义挑战再次要求安理会给予关注和认真考虑。

定期向安理会通报非洲和其他地区人道主义局势的发展，的确是非常值得欢迎和非常有用的。我们赞扬莫里斯先生以及粮食计划署的奉献精神和努力。他定期派代表团前往南部非洲区域，从而证明了联合国尤其重视尽可能有效和紧迫地处理该区域的危机和需要。

关于今天的会议，我们欢迎安全理事会有机会了解并审查可能对区域和平、安全与稳定构成不祥威胁的人道主义挑战，尽管安理会目前没有正式处理这些局势。

罗马尼亚无法接受这样一种想法：安全理事会这个负责维护和平与安全的主要国际机构可以有一些“静悄悄”或“被忽略”的危机。莫里斯先生明确提到的南部非洲一些地区——例如津巴布韦、马拉维、纳米比亚和斯威士兰——似乎是最脆弱、受粮食不安全、艾滋病毒/艾滋病感染率高以及治理薄弱三重威胁影响最严重的地区。在所审查的许多情况中，相当多的人口群体在政治上被剥夺权利，这种情况只会加剧这些因素合并产生的后果。如果不能够适当地加以处理，那么这些因素合并在一起，的确有可能影响该区域的和平与稳定。

罗马尼亚完全同意，由于其规模和严重性，南部非洲的危机需要国际社会持续支持加以处理。人道主义反应对这些国家来说，似乎至关重要，尤其是在粮食援助方面，因为在许多情况中，最近粮食不安全状况出现了加剧。

在这方面，津巴布韦局势尤其令我们关切。那里的局势正在恶化；在那里粮食长期短缺；需要援助的人数不断增多。我们呼吁该国政府与国际社会和人道主义机构合作，改善粮食安全状况，应付脆弱民众的需要。政府应该立即为各捐助方提供关于粮食援助需求的可靠数据。

最后，我们想听听执行主任莫里斯谈谈他建议安理会还可采取哪些行动来支持和补充驻南部非洲的联合国各机构、基金和计划署的人道主义努力。因为我们一直认为，只有综合与协调的行动，才能打破该区域贫穷和不稳定的循环。

埃米尔·琼斯·帕里（联合王国）（以英语发言）：与其他同事一样，我非常感谢莫里斯先生就南部非洲的粮食安全局势作了详细和发人深省的情况介绍，并作出了全面评价。我认为，这些情况介绍和评价成功阐述了他访问该区域之后了解到的实际情况。

在许多非洲国家，饥饿仍然是一个主要特征，这是令人悲哀的，但却是实际情况。今年，尽管粮食收成总体上比一般情况要好，但是在一些国家中存在着一触即发和实际已发生的重大危机。联合王国认真听取了执行主任就达尔富尔和其他地区局势所说的话。我们必须在我们的政策中对此加以考虑。

饥饿的根源是非常复杂的，但毫无疑问，它们是与治理以及和平与安全联系在一起的，而这些是安全理事会关注的主要问题。我想援引执行主任的话：“艾滋病、反复发生干旱以及管理失败的致命结合……正在侵蚀社会和政治稳定”（见上文）。这就是我们所面临的局面。即将于 9 月份举行的首脑会议将提供一个重大机会，在发展方面向前迈出一步，努力并按时实现千年发展目标。但从根本上讲，发展是捐助者与受援者之间讨价还价的一个对象。前者必须做得更多、更好；而后者必须解决治理和腐败问题，并且制定实现这些目标的政策。但是，治理本身是一国政治状况

的体现。不良的治理可能是缺乏民主、人权所受尊重降低或潜在甚至实际冲突的一种迹象。粮食短缺以及粮食分配不善是不稳定状况的已知原因，有可能导致增大冲突爆发的可能性。正如莫里斯先生所说的那样，饥饿既是冲突的原因，也是冲突的后果。这一点说得非常直截了当，而这一关系的两重性是显而易见的。

此外，不良的治理本身也是粮食不安全的一个原因。粮食危机常常是与获取粮食的机会以及政府的政策联系在一起的。它并不总是完全由农业生产引起。造成危机的原因常常是不良治理和管理不善，而非干旱。缺乏粮食、贫穷、因缺乏免疫措施而造成疾病增加，这些都可能导致难民人数增多。对区域和平与安全，或者——如莫里斯所说的——对稳定的影响，是明显的。

津巴布韦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那里的危机尤其令人忧虑。由于该国收成情况再次不好，国际社会已在准备增加援助。那里的贫穷社区受到严重的摧残，不仅是由于粮食产量过低，而且也由于持续经济崩溃破坏了它们购买粮食和其他主食的能力。目前我们也在应付另一场危机，这是一场因津巴布韦政府镇压该国最贫穷社区而引起的危机。多达 30 万人已经无家可归。数以千计的儿童被迫缀学。我们必须意识到，这场危机是由于津巴布韦政府的行动所引起的；它是一种人为的，非自然的现象。津巴布韦经济的崩溃是不良政策和不良治理所导致的。

阿马蒂亚·森提出的关于民主在预防饥荒方面的作用现已广为人知的数字，同样重要。他指出，在集权制度之下不可避免地发生大饥荒。所以，我们同其他人一样，期待着秘书长特使安娜·卡朱穆洛·蒂拜朱卡就其对津巴布韦的访问提出报告，我们希望安理会将给予应有的审议。

针对目前的危机，联合王国已经通过联合国各个机构提供了 57 万多美元，此外自 2001 年 9 月以来还为津巴布韦的救援和艾滋病毒/艾滋病方案捐助了一亿美元。如果情况不幸证明需要更多的捐助，我们将会给予考虑。

诚然，安理会成员应当对食品安全对冲突、和平与更广泛的安全的影响表示关注。但我们还必须强调：如同在津巴布韦一样，施政不良和未能同国际社会合作避免食品欠安全的情况，引起国际社会的合理关切。

我谨提出一些与我们认为可能会是未来行动的建议有关的准确看法。首先，执行主任描述了所谓食品欠安全、艾滋病毒/艾滋病以及被削弱的施政能力的三方面威胁。我们完全同意，艾滋病毒/艾滋病这一流行病增加了非洲很多贫穷社区的易受伤害性，削弱了很多政府对之做出反应的能力。国际社会需要提供更多帮助。

其次，需要密切监测非洲不断变化的气候模式的证据，以便注意其对食品生产和其他自然资源的长期影响。这应可帮助我们预测可能的食品欠安全的情况，并采取预防性行动。

第三，人道主义援助准入是关键，而执行主任谈到了他的工作人员面对的实际问题以及所遇到的悲剧。扬·埃格兰在我们就保护平民进行辩论时也提到了这一点，即在饥饿情况达到危机程度时，我们必须表明各国政府有责任向世界粮食计划署和所有其他人道主义机构和非政府组织提供充分合作，并准许他们接触那些需要帮助者。

当然，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政府的次要责任。它们的首要责任是保护自己的国民，决定保障他们的政策，以便争取避免这种问题。

第四，非洲饥荒的长期性质意味着：我们都知道必须特别注意如何能够比目前更快地确保实现“千年发展目标”。2150 年的目标是无法接受的。由于饥饿是长期贫穷而非无法预测的危机的结果，我们需要帮助非洲各国政府做出长期的反应，而不是依赖应急制度。同样，莫里斯先生关于埃塞俄比亚的数字，非常令人受启发。这种对通过在原籍地喂养和教育儿童来应付儿童饥荒的必要的强调，就是如何避免危机的好例子。

我向安理会中的广大同事提出的最后一点，这是预防远远胜于救援。安理会的主要作用是维护和确保

国际和平与安全，要做到这一点，我们就需要在冲突出现之前更好地预测和预防。当人道主义危机、非正义、压迫和不良的施政同时出现时，我们就有不稳定和冲突的危险，这时安理会和联合国就有责任更广泛地处理这种局势并争取提供帮助。

梅尔卡多先生（菲律宾）（以英语发言）：我们同其他代表团一道欢迎詹姆斯·莫里斯先生，并感谢他关于非洲食品危机的通报。我们赞扬莫里斯先生作为世界粮食计划署的领导所做的工作，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机构，把联合国带到世界各国人民的心目中。

莫里斯先生今天的通报，增强了维护和平与安全与发展之间不容置疑的联系，这是威胁、挑战和改革问题高级别小组报告（A/59/565）和秘书长题为“大自由”的报告（A/59/2005）中提到的联系。莫里斯先生的通报清楚地表明，我们在应付预防冲突、管理冲突和冲突后和平建设的问题时，还应当考虑到诸如食品安全等更切实的问题。

这是莫里斯先生自 2002 年以来向安理会所作的第三次通报，这一事实表明在几年之后，国际社会仍然需要专门拿出大量的时间和巨大的资源来化解非洲的食品危机。因此，我们欢迎有此机会同莫里斯先生就安理会在其和平与安全工作的整体范围内，仍然需要在处理非洲食品安全问题上做什么的问题交换看法。

在这方面，我们要问莫里斯先生一些问题。首先，世界粮食计划署同各国政府、联合国系统的其他部门、非政府组织和企业部门的伙伴们在紧急情况和发展项目方面展开协调与合作。尽管这些实体是重要的，然而我们认为区域组织也能够提供帮助。所以，我们想知道粮食计划署是否也同像非洲联盟和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这种区域组织建立了某种关系和安排。

其次，任何非洲国家在应付食品欠安全方面有没有任何成功的例子可以当作该区其他国家的样板？

最后，在其他论坛中就提高妇女能力的问题已经讲了很多，她们是主要的食品提供者和战胜艾滋病的关键。粮食计划署有没有针对妇女的具体项目？

马约拉尔先生（阿根廷）（以西班牙语发言）：我首先要感谢詹姆斯·莫里斯先生为我们所做的关于非洲食品危机的非常详细的通报。我们注意到，不幸的是危机不仅继续存在，在某些情况下更加严重。

在这方面，尽管我们知道无法完全控制和克服诸如干旱、疾病、卫生条件和大流行病等自然因素，然而我们能够而且应当争取消除阻碍世界粮食计划署工作的结构性因素，其中当然包括战争及其后果——例如同流离失所者和难民有关的问题——以及不良的行政、缺乏施政、不良的施政和同农产品的世界贸易有关的问题。这种因素在很多情况下是非洲以外的个人、首先是领导人的责任。

对于莫里斯先生非常详细地叙述的非洲的紧急情况，我们认为捐助国必须增加其对世界粮食计划署旨在减轻该大陆饥饿情况的人道主义援助。我们认为，从中期和长期来看，非洲公民自己必须制定各项政策并提供必要的领导能力，以使他们各国能够摆脱我们今天所了解的局势。

然而，国际社会正是在这一领域负有责任。它应该提供必要的鼓励措施，使发展中国家的农业生产变得稳定并适宜出口。我们知道，发达国家农业部门目前的补贴、配额和关税政策显然扭曲了这些商品的价格并阻止发展中国家生产和出口他们与发达国家所生产的货物具有明显相对优势的产品。显然我是指食品生产。

发展与和平之间的现存联系已得到强调。在这方面，我们认为国际社会必须推动国际贸易规则领域的结构改革，例如除采取其他措施之外促进关于农业产品的多哈谈判。

所有这一切将有助于发展中国家农业商品的国际贸易。

最后，我们要问一下莫里斯先生世界粮食计划署是否在考虑增加对非洲基本农业基础设施的微观和宏观投资。我们还希望了解世界粮食计划署与维持和平部之间在维持和加强粮食安全方面的现存关系，这是在非洲大陆维持和平与安全的基本目标之一。

北冈先生(日本)(以英语发言):我要感谢莫里斯先生所作的非常翔实而有力的通报。他根据其作为秘书长人道主义需求问题特使最近对非洲南部的出访对那里局势的解释特别令人信服。我们赞赏他所开展的一切辛勤工作。

我们同意以下观点，即正如莫里斯先生刚刚强调的那样，不解决饥饿问题便无法维持和平与安全。秘书长在其报告中指出：

> “全世界每年有 1 100 万儿童活不到 5 岁，有 300 万人死于艾滋病。这样的世界不是一个大自由的世界。”(A/59/2005 第 26 段)

饥饿对儿童的影响尤其具有灾难性，因为这一灾祸使儿童失学未来。绝望中的儿童由于没有获取食品的手段时常别无他则只能参军。因此饥饿还会加剧儿童兵的严重问题。我们对儿童被迫遭受这种痛苦深感不安，我们决心继续在此领域内提供援助，特别是通过实施学校提供食品方案。学校提供食品方案有助于帮助儿童恢复正常和平的生活，并有助于解决饥饿问题和推动教育。

学校提供食品方案在日本努力从战争中恢复过来时曾经发挥过非常有益的作用。这些方案包括美国、儿童基金和其他国家及组织所给予的援助。我们对此援助非常感激。

作为一种极端贫困形式的饥饿问题是由于各种相互关联的情形产生的。生产力低下由于冲突、自然灾害、艾滋病毒/艾滋病和管理不力而更为加剧。需要全面的措施来解决如此复杂的问题。此外，即使是在生产力相对较高时，效率不高的分配系统或由于某种原因而失常的分配系统也会阻止普通百姓获得食品。分配也是世界粮食计划署所开展的粮食援助行动的一项挑战。准确的需求评估和可靠的监测是将食品分配给有需要的人民手中不可或缺的手段。这两项工作均需要得到有关政府的充分合作。

基于上述，我想提几个问题。第一，世界粮食计划署如何与其他相关联合国机构合作以整体方式解决复杂的饥饿问题？在这项工作中，莫里斯先生希望政府间机构，特别是安全理事会做些什么？

第二，我假设，粮食分配系统的问题也会影响到莫里斯先生出访过的非洲南部地区的长期饥饿问题。可否举出此类问题的例子，并且世界粮食计划署目前在如何协助解决这些问题？

第三，莫里斯先生在获得有关政府特别是在需求评估和监测等问题方面的合作时有哪些难题？

张义山先生(中国):中方感谢世界粮食计划署总干事莫里斯先生的通报，而且我要感谢他对中国的扶贫减灾计划的积极评价。

粮食计划署多年来一直致力于向遭受灾难国家和人民提供紧急粮食援助，不仅缓解了受援国人道危机，而且为解决有关国家和地区的武装冲突提供了帮助。我们对此表示赞赏和支持。

粮食危机长期以来一直困扰着非洲许多国家。我们认为，贫困是产生冲突的根源，而冲突又是贫困加剧。消除贫困是世界和平、发展与稳定的需要，而结束冲突是根除贫困、保障粮食安全和实现持久发展的基本前提。非洲大陆冲突时断时续，与粮食危机问题有着直接的联系。作为对国际和平与安全负有重要职责的机构，安理会在对非洲冲突起因进行分析的时候，应该对此有着充分的认识，这样才有利于我们从根源上解决问题。

我们希望通过今天的会议，各方能对非洲粮食危机问题对该地区和平与安全的影响引起足够的重视，并采取切实措施帮助非洲大陆消除饥饿与贫困，这样才有助于真正实现非洲持久的和平与稳定。

瓦西拉基斯先生（希腊）（以英语发言）：我非常感谢世界粮食计划署（粮食计划署）执行主任莫里斯先生非常翔实地通报非洲粮食危机以及世界粮食计划署——我还要说，国际社会——在解决该大陆饥荒问题时所面临的种种挑战。我们认真注意到莫里斯先生的关切，很高兴我对此也有同感。

铲除饥饿不仅仅是一个崇高构想。长期以来，获得适当食物一直被认为是一项个人权利和集体责任。然而，饥饿——无论肇因战争、毒品、自然灾害、内部纷争还是贫穷——仍在造成广泛苦难。专家小组在其威胁，挑战和改革问题报告中承认，饥饿同导致大规模死亡或减少生命机会、破坏国家这个国际制度基本单位的任何事件或进程一样，也是对国际安全的威胁。

不幸的是，目前的趋势表明，许多国家、特别是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粮食无保障问题持续存在，并可能有所恶化。这是若干因素共同造成的：即不利的气候形势、健康因素、因难民和国内流离失所者产生的内部纷争、以及同施政和经济政策有关的问题。不幸的是，粮食仍被当作战争武器。安全和粮食保障之间有着牢固联系。出于所有这些原因，饥饿问题同安全理事会有密切关系，因此我们对今天的简报表示欢迎。

莫里斯先生给我们提供的数字令人震撼。这些数字表明，这是一场极为严重的人道主义局势。显然，为了避免灾难，必须立即提供适当程度的援助，但也必须采取长期措施和作出长期规划。这个挑战十分复杂，需要处理各种问题，例如，必须改善应急干预和后续行动的协作；可持续发展；以及人道主义准入同营养不良与贫穷之间的联系。达尔富尔和刚果民主共和国某些区域的情况显然表明，缺乏人道主义准入使得局势进一步恶化。

粮食援助的经费筹措严重不足。因此，我们大家知道，厄立特里亚有 2/3 人口面临饥荒危险，而在埃塞俄比亚，300 万埃塞俄比亚饥民也在危险之中。

政府粮食进口政策与环境政策、以及错误的经济政策选择和缺乏处理问题的政治承诺也起了一定的作用。例如，津巴布韦正面临着危急经济局势，粮食短缺，预算赤字膨胀，同时通货膨胀居高不下、失业以及艾滋病毒/艾滋病例越来越快地增长。同时，在实施土地改革政策后，投资者因对财产权和法制问题感到关切而大都逃离这个国家。

另一个同非洲非常相关的问题是莫里斯先生反复阐明的“三大威胁”：饥饿、艾滋病和政府能力低下。

最后，我要提几个问题。我们听取了对各个国家各种危机的各种估计。对满足非洲全部需要的总体需求是否有任何通盘估计？我们欢迎世界粮食计划署把铲除贫穷和给孤儿与脆弱儿童提供营养作为其政策优先。在这方面，莫里斯先生认为国际社会在儿童饥饿挑战方面可以具体做哪些工作？最后，鉴于艾滋病毒/艾滋病同贫穷之间的关系，我想知道他是否可以向我们解释一下，世界粮食计划署同联合国艾滋病毒/艾滋病联合规划署目前进行了何种合作。

阿霍-格莱勒先生（贝宁）（*以法语发言*）：我也要感谢粮食计划署（粮食计划署）执行主任詹姆斯•莫里斯先生出色通报南部非洲粮食危机。他提出的观点非常说明问题，因为这些观点有力地表达了非洲人民无声无息的痛苦。我们赞扬秘书长明智地主动派遣粮食计划署执行主任前往这一区域。

对全球粮食生产来说，保证全世界人民的粮食安全不是重大困难。分配问题却是一个挑战。在这方面，饥荒是最突出体现当今国际制度功能紊乱的灾难。显然，国际制度迫使穷国首当其冲地进行其运作所需的体制调整。农业补贴政策扼杀了发展中国家的农业部门，国际社会应该对此感到关切。国际社会应该鼓励发达国家进行必要改革，给发展中国家提供生存机会。国际社会必须特别确保全球分配粮食，以便减轻极度贫穷和自然灾害。

我们欢迎粮食计划署代表大规模饥荒受害国、特别是非洲国家从事各种活动。我们欢迎它强调和平时期穷国的危难，这些国家没有从国际社会得到促进其可持续发展所需的支持。

我们认为，政治争端不应影响提供人道主义援助。鉴于国际社会已经设立防治艾滋病毒/艾滋病基金，我们不理解为何政治因素会阻碍向艾滋病毒/艾滋病受害国提供援助。应该把粮食援助作为受饥荒和营养不良影响的社会、特别是极度贫穷在当地肆虐成风的国家一个振兴渠道。

国际社会必须充分行使责任，保护脆弱国家危难人口。国际社会应该承认，由于冲突、气候条件以及为生存和控制现有微薄资源的斗争，撒哈拉以南国家的长期不稳定使得和平与安全受到威胁。

许多代表团都强调，贫穷与冲突彼此相互关联。我们完全同意这种观点。安全理事会应该呼吁建立特别方案，拯救情况特别悲惨的国家。在这方面，我代表我国代表团对联合王国代表提出的采取协调一致国际行动在冲突爆发前预防冲突的呼吁表示赞同。

本迈希迪先生（阿尔及利亚）（以法语发言）：首先，我要感谢詹姆斯·莫里斯先生出色和全面地通报情况，这表明对和平、发展与人类尊严问题采取了综合办法。

莫里斯先生在通报一开始引证了奥巴桑乔总统有关一个饥饿的人是一个愤怒的人的话。而我要引证一位著名的法国政治家的话，他说，一个感到不满的人是一个会思考的穷人。

我国认为，尽管饥饿有其周期性的原因，如干旱和资源管理不善，也有结构原因。我不想重复本周在大会辩论中说过的话，这一辩论正在经济及社会理事会高级阶段继续进行，因为我们认为，这两个机构能够比安全理事会更好地查明障碍并提出解决方法。

然而，我认为，在结构原因方面，有关国际治理、粮食生产以及由于发达国家提供巨额补贴的不公平做法导致发展中国家农业衰弱的问题，同本次辩论是有关系的。

至于安全理事会的授权，我谨表示我们同意莫里斯先生的观点，粮食决不应当成为战争或外交压力的工具，不管别人如何看待一个政府。我们希望，安全理事会成员在本次辩论中将听到对这项首要道义原则的重申。

最后，我谨表示阿尔及利亚对粮食计划署正在非洲所作努力的赞赏，尤其是支持非洲发展新伙伴关系的目标，并对它在国际一级所作的努力表示赞赏。我们保证向它提供支持。

帕特森女士（美利坚合众国）（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我谨向你表示感谢，并且也感谢莫里斯先生就非洲饥饿同和平与安全之间的联系所作的内容丰富的通报。这是安全理事会非常合适的讨论议题。

非洲的各项挑战非常令人信服地要求进行国际合作，以支持该大陆实现持久进步、和平与安全的努力。我们谨提请注意一些特定局势，那里的饥饿继续威胁非洲大陆的和平与安全。

在苏丹，满足达尔富尔的人道主义需求的资源不足可能加剧现有紧张局势和暴力，并造成更多的跨越边界进入乍得东部的流离失所人民。在苏丹南部，粮食捐助的减少将阻碍重新安置工作，并使当地居民和返回人口本来就稀少的家庭资源进一步达到极限。

埃塞俄比亚，除了目前严重的危机之外，遭受长期干旱和人口过剩、土地退化、市场制度和基础结构不良，以及拖延执行公共安全网方案造成的问题。

美国认为，至少 1 200 万人面临风险，联合国估计，50 多万儿童具有不同形式的营养不良。该国一些地区存在着地方性饥荒条件，如果不提供更多资源以满足紧急人道主义需求，局势可望恶化。

在西非，粮食资源管道不足已经迫使世界粮食计划署（粮食计划署）减少在塞拉利昂的难民营中的配给。在利比里亚，返回者重新安置一揽子计划的不足将由于今后几个月中配给的减少而更加复杂，同时正遇上全国选举。这些可能成为本来就动荡的环境中的爆发点，并进一步阻碍重新安置进程。

尼日尔政府最近也宣布了粮食安全紧急状况。联合国报告说，该国 360 万居民，包括 80 万儿童，情况危险；那里 13.4%的儿童急性营养不良，2.5%严重营养不良。这种惊人的比率通常与陷于冲突的国家有关。

在南部非洲，粮食计划署打算向 800 万人提供粮食援助。目前，粮食计划署在该地区所有六个国家的储存和粮食管道极其有限。如果得不到新的承诺，粮食计划署将无法满足南部非洲数百万极其脆弱的人

民的粮食需求。毫无疑问，这关系到人命。最近在善政方面以及接受抗反转录病毒疗法人数方面的微弱收获也面临严重威胁。

津巴布韦是一个特殊问题，它的粮食问题具有政治动机，不是自然条件引起的。我们深感关切的是，目前摧毁低收入住房和非正式企业的运动至少造成了 42 万人无家可归，其中许多人是儿童。剥夺这些人的住所和收入加剧了本来就严重的人道主义危机。我们准备向津巴布韦提供大规模粮食援助，就象我们在 2002-2004 年期间那样，但是我们坚决反对使问题变得更糟的政府政策，并且我们敦促政府停止摧毁贫民窟的运动。我们敦促政府同反对派和公民社会进行对话，结束津巴布韦的政治僵局，并制止经济的持续下降。津巴布韦自己引起的经济瘫痪影响到整个南部非洲的贸易、投资和粮食安全。

布什总统向捐助界国际伙伴提出挑战，要求向非洲提供更大援助，解决联合国指出的严重的人道主义需求。美国已经在本财政年度向非洲的人道主义需求提供了将近 14 亿美元，我们不久将再提供 6.74 亿美元。今天，布什总统宣布，他将请国会到 2008 年为止花费 12 亿美元，帮助消灭疟疾，明年将造福 120 万人，其中 95％是在撒哈拉以南非洲。

美国认识到，全球粮食不安全是一个复杂和能动的问题，没有标准答案或解决方法可以适当处理我们今天面临的所有国家和区域危机。国际社会必须继续发展足够灵活的工具，解决每个特定危机的独特的根源。

非洲国家本身要对其公民的福利负责。它们必须采取适当行动，解决危机的根源。营养不良，特别是儿童营养不良，有着长期、不可逆转的后果，最终减少经济生产力并阻碍发展。

最后请允许我指出，吉姆·莫里斯作为粮食计划署署长和秘书长南部非洲人道主义需求特使发挥了巨大的领导作用。我们也谨赞扬粮食计划署在世界各地的现场工作人员所做的艰苦的工作。

马农吉先生（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以英语发言）：我们也感谢特使詹姆士·莫里斯先生的通报和他为提高全球对非洲面临威胁的认识所作的努力。我们今天向特使表示欢迎，坚信他的与会将调动并指引全球、区域和国家一级的努力，支持满足非洲的紧急人道主义需求。

被描述为三重威胁的粮食不安全、治理能力脆弱和艾滋病毒/艾滋病，是对非洲的真正的威胁，但是我们认为，这是能够克服的。能够以支助、技术援助和对话加以克服。

非洲有着巨大潜力。它有着大量肥沃的农田，丰富的自然资源。

但是，影响我们地区的广泛粮食危机和人道主义危机还显示，本地区非常脆弱。安哥拉、莱索托、马达加斯加、马拉维、莫桑比克、纳米比亚、斯威士兰、赞比亚和津巴布韦部分地区目前面临的粮食短缺局面的一个共同原因是，在本作物生长季节，气候异常。在一些国家，这是连续第三年或第四年作物歉收。持续干旱以及降雨时间太晚使许多农民几乎没有或者完全没有收获。我们了解这一点。在我国，我们认为我们是幸运的，因为本作物季节显示，仅仅因为降雨量增加，今年的粮食局面比去年好。

广泛的贫穷还限制了非洲农业部门的生产力。人们已经指出，艾滋病毒/艾滋病蔓延使贫穷问题更加复杂，艾滋病毒/艾滋病蔓延对土地耕种面积产生了影响，因为农民或因为自己生病，或因为需要照顾生病的家人，丧失了耕种能力。本大陆多数国家的经济以农业为基础，依赖出口传统产品或初级农业产品，这更加重了本大陆的脆弱性。我们进口多数制成品，包括机械和化肥等农业投入，我们进口这些制成品的贸易条件不利于我们的农业和工业部门。必须处理这种制度性的不平衡。

非洲国家在地域上、经济上和发展程度上存在差异。气候条件并不一致，因此，生产的作物和作物格局也不一样。相应地，这也表示，在粮食危机方面存在着不同的弱点。有些国家——例如纳米比亚、博茨

瓦纳、津巴布韦和赞比亚——一直被干旱和饥荒所困。

关于施政方式对饥饿和贫穷的影响程度，已经有大量书籍论述。没有任何人可以幸免于批评；我们所有人都有改进的余地，我们必须努力改进。此外，我们必须学会进行对话，促进我们的共同愿望，促进我们向前迈进的集体承诺，造福于全体人民。在应对这些挑战——施政、缺乏粮食安全和防治艾滋病毒/艾滋病——方面，存在着能力差异。该地区各国需要获得援助，以提高和维持它们的能力。

例如，南部非洲地区也在应对这些挑战，该地区认为，我们的人民期待并且要求，通过推动区域带动和以区域为基础并且向穷人倾斜的经济增长，改善他们的生活品质。下述行动就是这种努力的说明。

2003 年，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南共体)制订了《2003-2007 年南共体艾滋病毒/艾滋病战略框架和行动纲领》。2004 年，我们制定了《南共体区域指示性战略发展计划》，勾勒了一体化社区的蓝图。同年，我们还通过了《关于农业和粮食安全问题的达累斯萨拉姆宣言》，除其他事项外，该宣言力图发展一个预警和弱点监测系统——一个干预战略，我们认为，这个战略可以成为与国际社会建设伙伴关系的宝贵切入点。此外，我们还于 2004 年 11 月通过了《关于大湖区和平、安全、民主与发展的达累斯萨拉姆宣言》。最后，我们还在 2004 年 8 月举行的首脑会议上通过了《南共体民主选举原则和准则》。

曾有许多人为非洲流泪——我甚至可以说，有些人根本是虚情假意。我们了解这一点，因为，作为一个接纳大量来自战乱国家难民的国家，我们看到，一再发出的粮食援助呼吁无人响应。本组织的档案里充满了良好的意图。我们所有人都擅长高谈阔论，拙于行动。我们希望，今年 9 月的高级别全体会议将提供一个我们不应该错失的机会——一个转折点。

非洲需要国际社会的支助，以使该地区能够面对它所面临的各种挑战。该地区有克服难关的坚定集体决心。现在急需具体响应特使的呼吁，特使的呼吁是一项人道主义行动，必须响应。

最后，关于津巴布韦，据报道，城镇居民被迁移，我们对此也感到关切。我们注意到，秘书长已经派遣人居署执行主任安娜·蒂拜朱卡女士担任他的特使，前往审查政府“恢复秩序行动”造成的后果。关于实际迁移的人数，安理会刚才听到了相互矛盾的数字。我们认为，在澄清这个事项之前，不要对这个问题做任何判断。

主席（*以法语发言*）：下面，我以本国代表身份作简短发言。

首先，我要感谢莫里斯先生就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作极为明确、简洁和有趣的通报。我借此机会赞赏莫里斯先生和世界粮食计划署的努力。

我要向莫里斯先生提两个问题。第一个涉及到接近人民以及与此相关的人道主义人员安全问题。我们知道，这是一个关键问题。扬·埃格兰 6 月 21 日在安理会发言时指出，他对这个问题感到关切。尤其是，他要求加强维持和平行动的授权，他提到建立安全区或完全走廊问题，这些安全区或完全走廊将与人道主义优先事项有关。我想知道，根据莫里斯先生在当地的经历，他怎样看待这个问题。

我的第二点评论是：莫里斯先生对儿童、尤其是南部非洲儿童营养状况的叙述令人震惊。我们意识到，他努力促进制订一项全球举措，消除儿童饥饿现象。莫里斯先生不妨告诉我们，他期待国际社会做些什么，以及如何把这项倡议同儿童基金会和世界银行在该地区的活动相协调。

最后，我们认真地听取了莫里斯先生有关他对南部非洲访问的报告。我们已注意到他介绍的当地局势情况，特别是有关津巴布韦局势的情况，他说，那里有 400 万人口有危险。法国关切津巴布韦的粮食局势，我们希望，国际社会包括世界粮食计划署的努力，能成功可持续地改善该国人民生活。

现在我恢复行使安全理事会主席责任。

我再次请莫里斯先生发言，回答安理会成员提出的问题和意见。

莫里斯先生（以英语发言）：我感谢安理会各成员提出有洞察力、有益、有助和激励性意见和问题。我将尽力答复。成员们提出的许多问题需要较详细的答复，我们将设法尽快用书面形式提供这种答复。

第一个问题涉及苏丹：苏丹南部及其当地的人道主义问题，包括难民问题。局势非常严重。据我们估计，达尔富尔除外，当地受目前和平进程影响地区还有 320 万人需要帮助。有人在返回，但是逃离人数，如逃往肯尼亚成为难民的人数，现在实际上比返回苏丹南部的人数多。

我认为，整个人道主义界资金严重不足。我不是来这里要钱的；这不是我参加今天上午会议的目的。但是，在 21 年的冲突过程中，安理会成员已经为和平进程投入几十亿美元，提供食品、住处和其他人道主义援助。我担心的是，在人们返回家园时，如果我们不能至少提供食品、水和住处，可能出现大问题。我想，许多人有同感。

在达尔富尔我们做得比较好，资源工作相当充足。达尔富尔安全问题风险较大。现在我们已经肯定，在达尔富尔饥饿高峰季节最严重时，可能需要为 350 万人口提供食品，我甚至听到有人有时提出，这个数字可能高达 400 万。现在基本上有 150 万国内流离失所者；但达尔富尔今年没有作物生产；除非人们感到可以安全有保障地返回家园，否则明年也不会有植物生产。最担心的是，如果人们不放心返回家园，重新开始生活，开始务农，我们可能面临在阿尔及利亚遇到的情况，西撒哈拉难民已经在阿尔及利亚居住了 27 年，难民营中出生的人数已经超出原先进入难民营的难民人数。

因此，根本在于恢复秩序、和平与安全，使人们可返回家园。但事实上，达尔富尔地区另有 200 万人口将依靠现在流离失所者从事的农业生产。为了维持和平，我们必须象重视流离失所者和难民问题一样重视当地社区，否则可能发生动乱：可能出现这样的局面，由于世界粮食计划署、儿童基金会、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和各种非政府组织努力有效地改善难民营中营养不良状况，突然难民营中人口的营养状况，尤其是儿童的营养状况，大大超过难民营四周居民的营养状况。

我们非常幸运，乍得政府和乍得东部人民非常友好地欢迎从达尔富尔地区进入乍得的难民。但这带来了一个十分庞大的责任。我们看到，随着这批人口的流入，水资源和粮食资源已经不堪重负；国际社会已经作出慷慨响应，帮助当地居民。我怀疑，我们现在正为乍得境内 200 000 至 250 000 难民提供粮食援助，并最终或许将为相当数量的当地居民提供粮食援助，虽然人数可能不会那么多。

因此，我吁请安理会继续高度关注我们和整个人道主义界在苏丹的工作。风险很大。我不想为累赘重复，但指出，5 月我们为 180 万人口提供食品。苏丹北部和南部另有 70 万人口需要食品援助，但是由于安全问题，我们根本无法把援助送到他们那里。因为雨季，我们曾经并继续有食品可提供。我们已合同雇佣了近 900 辆卡车，但是过去一个月已有三名私营合同商的卡车司机遇害。不难想象，这对想做这种工作的人的影响。

就人道主义行动和长期行动而言，安全问题最为突出。在苏丹，我们同维持和平行动部非常密切地合作。我们支持机构间进程。我们理解并支持综合行动的主张。在苏丹，我们同秘书长特别代表普龙克先生及其副特别代表们密切合作。我们必须谨慎，不能在公众印象中不混淆人道主义界的作用与维和人员的作用。我们必须协作，然而，一旦冲突人口认为人道主义界是维持和平或军事活动的延伸，他们象传统那样尊重人道主义空间的可能性就减少了。

我们的工作是为饥饿、有危险的人口提供食品，政治问题有其他方面解决。我们只关心在冲突局势中，哪些人在饥饿——主要是妇女和儿童。我们必须得到争端所有各方的尊重，才能开展工作。显然，我们参与联合评估团进程，今天我们讨论有关如何协同努力比三、四年前多得多。

非洲南部和联合国家庭如何共同努力问题，可能不是头版新闻消息。但是，现在在约翰内斯堡，整个联合国家庭已经携手努力，许多组织的区域办事处设在约翰内斯堡。世界卫生组织、儿童基金会、联合国粮食与农业组织办事处基本上合用同一地点。各组织区域主任目前正作为同一团队工作。这就是联合国改革的体现，在实地、在外地的体现。它之所以发生，首先是因为危机规模很大，此外也由于人们把重点放在受益者身上。我告诉粮食计划署的同事，如果我们能够与受益者一道开展工作，那么有关粮食计划署的其他所有事情都能得到解决；我们将不必为此担忧。联合国艾滋病毒/艾滋病联合规划署(艾滋病规划署）也是这项努力的一部分。我认为，各成员都会对联合国大家庭在区域一级实地开展工作的方式感到非常满意。

我们正在努力使联合国国家工作队反映同样的协作。这要求新的领导意识，要求在驻地协调员中形成一个新的领导层。在莱索托、斯威士兰、博茨瓦纳和纳米比亚这些人口不到 200 万的国家，如果突然间冒出 30 个捐助者和 10 个联合国机构，而政府又由于我们所述的各种原因，能力遭到大大削弱，那么政府就会完全不知所措。他们就得花时间来应付我们，而不是侧重于实质性议程。我们必须找到办法，使联合国系统能够几乎完全汇合在一起，尤其是在非常小的国家里。我感到鼓舞的是，博茨瓦纳等各国都非常希望这样做。

如果把我们今天的情况与三年前的情况作一比较，我们就会发现，我们已经取得相当大的进展。在我们着手派出代表团之前，我总是先与各非政府组织的领导人会面。的确，他们都无一例外地要求联合国系统作为一个单一的系统合在一起，因为这样做对它们很有好处。

我们在津巴布韦所面临的问题很富有挑战性，而且很棘手。在那里，目前大约有 400 万人面临危险。在高峰时期的 2003 年，我们为津巴布韦的 550 万人提供了粮食。在 2004 年，这一数目降到 400 万人；今年 4 月，我们为 110 万人提供了粮食。我必须告诉安理会，我们最开始是与四个非政府组织伙伴进行合作。最多时，我们曾与 23 个非政府组织合作；今天，与我们合作的有 15 个非政府组织。

我在上个月拜访了穆加贝总统。我们进行了非常坦诚的对话，讨论了让我们前往该国任何地方以便为最饥饿和最贫穷的人们提供粮食的重要性，以及不对我们去何地以及我们的工作方式施加任何干涉或政治指示或影响的必要性。我当时说，没有我们的非政府组织伙伴，我们便无法开展工作，它们需要受到尊重和支持。

三年前，在我进行第一次访问时，我曾直接了当地说过，如果我们没有这种自由和灵活性，我们就干脆离开——我们绝不容忍任何干涉。我必须说，安理会对我们的支持使我们得以开展工作，分发世界粮食计划署所收到的粮食。我们开展了工作，对那些最需要我们帮助的人作了回应。这次我再次进行了同样的对话，并且强调了非政府组织的重要性。

我可以毫不含糊地向安理会保证，各成员为我们提供的粮食正送到津巴布韦境内需要帮助的人手中。此外还有一些其他来源的粮食，政府正在进行分配。我与总统就政府遵循我们所实行的同样国际公认政策的问题，进行了同样的对话。但是我可以向安理会保证，各成员向我们提供的粮食正送达需要粮食的人那里。

这是一种艰难的局面。大家也许记得，一年前，他们估计，他们的谷类作物收成将是 240 万公吨。他们需要 180 万公吨的谷类来供应给居民。由联合国、非政府组织和政府的代表组成的津巴布韦脆弱性评估委员会所估计的最好情况是，作物收成将为 40 万至 60 万公吨。这同粮食计划署和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将共同进行的粮食评估调查有出入，但这一估计很成熟，我们对它相当有信心。我们可以对你们说，我们相信这一估计。正如我所说的那样，津巴布韦需要 180 万吨粮食来养活国民，并且曾说过作物收成将为 240 万公吨。因此，现在最坏的情况是短缺 140 万吨粮食，即使在最好的情况下也仍短缺 120 万吨。

津巴布韦政府说过，“我们会自行处理。为我国人民供粮是我们的责任，我们已正式提出并承诺购买120 万公吨粮食”。这是公开的立场；如果他们被问到这个问题，他们就会这样回答。他们也会说，他们会额外购买 60 万吨粮食来补充他们的储备。他们不愿意请求国际社会提供帮助，但他们会说：如果国际社会决定提供帮助的话，那他们会很欢迎。我们不愿意听这样的话。按照我们的传统做法，如果有关方面能够说出他们需要什么，并作出解释，那么事情就会好办些，我们也就可以努力满足。

我们差不多已经说过，我们将努力筹集大约 30 万公吨的资源和粮食。显然，如果能够拿到 120 万公吨的粮食，并生产出 40 万到 60 万公吨的粮食，再加上另外的 30 万吨，那么总数会略超过所需的谷物数量。确切情况只有到时候才会清楚。这是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显然他们遇到了很糟糕的天气状况，但是大家对当地情况动态的了解不比我差，甚至可能比我还清楚。去年，世界上有几个地方令我非常担忧，其中包括北朝鲜和苏丹，这同属那一类别。因此，我们只想提一下而已。

我感谢俄罗斯谈到了多边办法。一国选择帮助另一国的原因有多种多样。如果我可以告诉各位，通过多边支助——经由象我们这样的机构，或经由非政府组织提供的多边支助——我们所分配的粮食中有 90 %都送到一个国家的最饥饿、最贫穷人们手中。我们没有什么事先计划，只有人道主义宗旨，那就是确保面临最大危险的人——通常是妇女和儿童——能够有饭吃。我们知道，我们非常善于评估需要，确定分配对象，而且善于实际从事分配工作，其后衡量、监测和评价我们已经做的工作。我们对你们负责。

因此，在你们思考我们应当订立何种计划的时候——我赞赏各种办法的公正性——应当想到，采取人道主义做法，将粮食送到面临最大危险的人手中，其最佳途径往往是通过多边机构。我们并不把粮食折成钱。我们非常尊重市场。因此，我只想简要地谈谈这一点。

我感谢巴西代表提到了被遗忘的紧急情况的概念。我们都把注意力集中于海啸，或者集中于达尔富尔；然而事实是每天死于饥饿的人中 92%将死在没有成为头条新闻的地方、人们根本想不到的被遗忘的地方。在玻利维亚、马拉维或孟加拉国尘土飞扬的道路上丧失的生命，同在引人注目的局势中丧失的生命一样宝贵。我们在海啸问题上获得了慷慨的资助；我们收到了我们所需要的所有资金。然而事实是每天有 25 000 人死于饥饿——其中 18 000 是儿童，即每五分钟就有一名儿童死亡，天天如此。世界上各地区每 10 天就会有一次“海啸”。

罗马尼亚同事问道安理会能够做什么。这是全世界最重要的决策机构。安理会像今天和前几次一样，集中注意饥饿的问题，这一事实是一种强大的信息。

我试图答复联合王国同事，他谈到了建设能力的问题。

显然，气候变化是肯定的，但这方面是有区别的。我们今天正提供三倍于 1960 年的自然灾害评估。我不是一个科学家，但我知道情况已有改变。

人道主义援助准入是我们工作的一个基本原则。我们很少对此作妥协。我们要求完全接触到我们展开工作的任何国家的任何人口。对于人道主义援助准入的安全方面，我们去年把我们的安全保护扩大到四倍。这对我们的预算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它花费更多，减少了我们向人民提供食品的资源。我们在全世界有135 个根据联合国安全协调员的标准被列为第三或更高阶段的工作地点。安理会中的几个成员表彰我们的工作人员。他们做出了非凡的人道主义承诺。我们的大楼里有一面荣誉墙。世界粮食计划署有 62 人在人道主义工作中被打死。我们要求我们能够到达任何地方。北朝鲜大约是世界上我们无法完全进入的唯一地区。我们能够进入北朝鲜 203 个县中的大约 160 个县。这是我们在准入要求上多少作妥协的唯一地方。

我赞赏安理会成员提到了“千年发展目标”和儿童饥饿问题。我坚信由粮食计划署、儿童基金会、世界银行和相关的非政府组织所领导的、得到企业界、

宗教界和青年服务界的支持的全球联合努力，将会取得成果。我要指出，非洲大约有 1 亿 1 500 万人需要帮助，其中 9 300 万是儿童和他们的母亲。由一个健康的母亲所生并得到一个健康的母亲抚养，是任何东西都无法取代的。根据我们的估计，做到这一点每年大约花费 50 亿美元。其中 40％到 50％由东道国政府提供。肯尼亚以非凡的方式支持我们在该国喂养儿童的工作。马拉维也做了同样的事：它承诺提供 1 300 万美元帮助支持粮食计划署在该国的工作。

我感觉我们需要在全世界展开一场运动，主张不能再接受儿童受饥饿的情况。如果人人都能做一点事，那该多好。做到这一点的费用，等于我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向比利时人民提供食品所花费的资金；等于我们在柏林空投期间向人们提供食品所花费的资金；等于我们在巴黎建造迪斯尼所花费的资金。我们需要确定国际社会如何能够在世界上消灭儿童饥饿的现象。安理会将看到儿童基金会、世界银行、红十字会和各种人士动员起来在这方面采取行动。

我们现在有很多商业伙伴。没有如下伙伴的帮助我们就无法在海啸灾难中完成工作：花旗公司、波士顿咨询集团以及荷兰的 T&T 公司。后者拥有 175 000 名雇员。他们每个人都承诺喂养一名在校儿童，公司则承诺拿出等额捐款。只要我们开始汇集足够的捐助，就能够取得成果。

加拿大为喂养非洲五个国家的儿童做出了非同一般的承诺。我可能前面已经提到，该国在马拉维对女孩受教育的承诺，使女孩入学率在两年中从 34％增加到 43％。我希望法国和比利时将特别注意非洲讲法语的国家。尼日尔的儿童入学率非常低。

我们有机会在中美洲建立同样的伙伴关系。在像危地马拉这种地方，50％五岁以下的儿童长期营养不良。萨尔瓦多、洪都拉斯和尼加拉瓜的数字少一些，但也很庞大。美洲开发银行、企业界和世界银行正在这方面介入。

这些是可为之事，显然是非常重要的事。我希望我们将找到方法建立这种非凡的伙伴关系。如果我们喂养世界上 3 亿名饥饿儿童，就等于喂养了一半的饥饿者。你如果喂养一名儿童，就对降低婴儿死亡率、产妇保健、性别平等——女孩受饥饿的比例失常——艾滋病毒/艾滋病的问题和普及初等教育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这碰巧是“千年发展目标”中的前六个目标。如果我们集中注意儿童饥饿问题，就能够在这方面取得巨大的进展。

我还赞赏日本代表所提的看法。在日本或在德国同受益于重建其教育体系以及国际社会通过学校系统慷慨提供食品、牛奶和谷物的人交谈，是一种非常令人感动的经历。日本前农业大臣告诉我，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进入日本，向日本人提供牛奶和谷物，挽救了日本的教育体系并改变了他的国家。德国的部长们也告诉我同样的经历。事实是世界上每个儿童都能得到这种支持。这种支持开始消除嫉妒和愤怒，为和平与安全做出了巨大贡献。

我们同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世界卫生组织、儿童基金会、联合国粮食和农业组织、国际农业发展基金、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联合国人口基金会和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非常密切地合作。我不想花大量时间说明细节，但尤其是在实地，各种伙伴关系非常良好。

我赞赏中国所作的承诺。我们在中国工作了 40 年，向数千万人提供食品。中国不再需要我们。我们将于今年 12 月结束在中国的行动，中国将成为对粮食计划署的主要捐助国，这是一个非凡的转变。粮食计划署永远准备在紧急情况下帮助中国，但该国将成为一个重要的待命伙伴，帮助我们对紧急情况做出反应。

希腊代表提出关于儿童饥饿的问题。我们是联合国艾滋病毒/艾滋病联合规划署的非常密切的伙伴。艾滋病规划署的署长会说，饥饿和营养是战胜艾滋病毒的最重要因素。如果人们营养充分，就有更好的机会抵御疾病。如果他们被感染但营养充分，就能够抵御乘机而入的疾病。如果他们一直相当不错，且营养良好，就会多几个月或几年的时间同他们的子女一起生活。

除此之外，在同艾滋病毒进行斗争中，世界需要作出的最为重要的努力是教育 5 至 15 岁的儿童了解这一疾病的严重性。在儿童还在学校期间和在儿童还需要抚养期间进行教育最为适当，这样他们能够在学校学到知识。彼得·皮奥特会告诉大家，当他前往一个艾滋病毒较为泛滥的村庄时，他们首先要的是食品和饮水。抗肿瘤病毒治疗在一个营养不良的身体上不会发挥作用。

我要感谢我们阿尔及利亚同事，该国已经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捐助国。我们同非洲联盟在非洲发展新型伙伴关系的框架内密切合作。有关非洲基础设施基本投资问题，曾经有 12%的官方发展援助用于基本投资。这一数字现在已经降到 4%。非洲 80%的人口依靠农业，农业基础设施投资削减三分之二简直不可思议。非洲发展新型伙伴关系和非洲联盟已经承诺鼓励非洲国家在基本农业基础设施方面投资 10%。如果成功，则将产生深远结果。

我们开展了许多小型的食品换工作项目，在这些项目中我们对小型灌溉系统进行投资或对重新修建公路进行投资，但我们不具备开展宏观工程的能力。这是非洲发展新型伙伴关系和非洲联盟朝着正确方向迈出的重要一步。

我们显然非常感谢美国。它对尼日尔的重视使我有机会不仅提及非常严重的蝗虫灾难，而且能够提及以下事实，即在属于世界上入学率最低的九个萨赫勒国家中，我们有机会同九位卫生和教育部长共同努力，大幅扭转这一局面，特别是扭转像尼日尔这样的国家和地区的局面，那里只有 20%的儿童能够上学。我们知道，如果学校有饭吃，儿童就会来，他们会呆在那里，他们会学习，并且如果他们连续上学一个月，我们就送他们一包蔬菜油带回家，作为某种程度上来弥补家庭因儿童上学而缺少了帮手。

我要向坦桑尼亚代表说明，我们同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密切合作。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是我们区域工作、粮食安全、艾滋病毒工作、早期预警系统等方面的非常密切的伙伴，这是件好事。

法国代表提了一个有关接触人口和我们的工作人员的人身安全问题。我希望我已经回答了这一问题。他还提到儿童营养问题。我们非常重视碘、铁、维他命 A；我们知道，如果我们能够强化食品——强化一块学校用的饼干或某种其他分配的食品是非常廉价的——小小的投资便会产生所分发商品的很大的效应。

我希望，诸位将帮助我们思考我们应如何继续这一运动，这一伙伴关系，改变世界儿童饥饿的问题。如果你能为一位年轻的女孩提供食品，她就会读几年书，她整个生活都会发生变化。我们只需 16 美元就能为一名孟加拉国的儿童提供一学年的食品。我们只需花费 24 美元就能养活一个北朝鲜的儿童一年，一般来说，一年只需 35 美元我们便能为一名儿童在一学年当中每一天提供一顿餐饮。投资的力量是巨大的。

主席（以法语发言）：我要感谢莫里斯先生刚刚为我们提供的更多信息以及为安理会成员提供的答复。

我的发言名单上不再有发言者要发言。安全理事会就此结束目前阶段对其议程上项目的审议。

下午 12 时 40 分散会